

港口犹太人贸易网络 与犹太社会的现代转型^{*}

张倩红 艾仁贵

摘 要：在近代早期世界的诸多港口城市，活跃着一批频繁开展跨地区交往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及其后裔，这些港口犹太人参与到殖民扩张和跨大西洋贸易中，形成了连接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乃至太平洋的全球性贸易网络。港口犹太人由于其商业地位而赢得了主体社会的认可，进而获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公民权利，该群体蕴含着现代商业社会的诸多特征：空前的流动性与亲族关系网络、“全球族”的跨文化群体属性、商业价值的主导地位、现代经营手段与信用工具的运用、对传统宗教权威的挑战、法律与社会地位的提升，等等。存在达三个世纪之久的港口犹太人及其贸易网络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推动了近代早期全球经济联系的扩展，而且促进了犹太社会的现代转型，代表着犹太社会内部孕育现代性的另一条路径。

关键词：犹太人 贸易网络 商业社会 社会转型 现代性

作者张倩红，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州 450001）；艾仁贵，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副教授（开封 475001）。

长期以来，人们把犹太人誉为“现代性的先行者”（forerunners of modernity），^①认为犹太社会较早产生了现代性因素，支撑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在 18 世纪下半叶中东欧地区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间，摩西·门德尔松发起服膺理性、接纳世俗知识的哈斯卡拉运动（Haskalah，即犹太启蒙运动），与主体社会建立起广泛联系，并对拉比宗教权威发起挑战，所有这些行为严重削弱了传统力量，使犹太社会陷入危机之中，进而开启了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这种长期主宰传统犹太史叙述的“阿什肯纳兹中心”倾向，^②把阿什肯纳兹群体中的宫廷犹太人与马斯基尔（Maskilim，犹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犹太通史”（15ZDB060）阶段性成果。

① Chad Alan Goldberg, *Modernity and the Jews in Western Social Though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p. 104.

② Jacob Katz, ed., *Toward Modernity: The European Jewish Model*,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7.

太启蒙分子) 视为现代犹太人的先驱者。这条以思想启蒙与文化融合为核心的阿什肯纳兹路径, 通常被看作犹太社会现代转型的唯一道路。

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 在哈斯卡拉运动之前一两个世纪, 现代性因素在犹太世界内部的另一主要群体塞法尔迪人^①及其后裔中间滋长。塞法尔迪人及其后裔由于 1492 年西班牙大驱逐而散布在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乃至太平洋地区的诸多港口城市, 这些港口犹太人通过开展频繁的贸易活动, 穿梭在各大殖民帝国之间, 形成了连接欧洲主要强国及其殖民地的全球性海洋贸易网络。在广泛参与近代早期殖民扩张和国际贸易活动过程中, 港口犹太人由于其商业价值而赢得主体社会的认可, 其法律与社会地位获得许多前所未有的提升, 具备了现代社会的诸多特征, 从而为犹太社会在哈斯卡拉运动之外开辟了“通向现代的另一条路径”。^② 罗伯特·塞尔茨注意到: “(17 和 18 世纪) 在荷兰、英国和其他地方的新的赛法迪姆居民点……在几个方面成了现代犹太历史的先驱者。他们在世界最富有活力的日益扩展的经济中, 介入了远距离和先拓性的经营活动。作为个人, 他们比其他任何散居区的犹太人享有更多的政治安全, 和得到更高程度的社会承认。尽管他们不享有和基督徒同样的权利, 但他们作为犹太人的法律地位, 比其他任何地方的犹太人均较少受到限制, 较少承担特别的义务和负担。”^③

曾在近代早期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塞法尔迪犹太人群体, 很长时间内并未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英国犹太学者塞西尔·罗斯是研究塞法尔迪犹太人的权威, 他在 1932 年出版的《马兰诺的历史》^④ 中对塞法尔迪群体的社会地位首次进行了系统探究。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 有学者开始关注塞法尔迪犹太人对殖民扩张活动的参与及其构建的贸易网络, 将之视为一种早期全球化的典型个案加以探讨。1997 年布朗大学举办了“犹太人与欧洲向西半球的扩张”学术会议,^⑤ 随后乔纳森·以色列和

① “塞法尔迪人”(Sephardim) 一词源自希伯来语“Sefarad”, 原意为“富庶之岛”, 《圣经》中以该词指称物产丰富的伊比利亚半岛。塞法尔迪人和阿什肯纳兹人(Ashkenazim) 共同构成中古与近代早期犹太世界内部的两大主要群体。与主要分布在中东欧地区的阿什肯纳兹人不同, 塞法尔迪人一开始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 1492 年西班牙大驱逐后分散开来, 主要分布在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等地的港口地区。

② Yosef Kaplan, *An Alternative Path to Modernity: The Sephardi Diaspora in Western Europe*, Leiden: Brill, 2000.

③ 罗伯特·塞尔茨:《犹太的思想》, 赵立行、冯玮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 第 507 页。

④ Cecil Roth, *A History of the Marrano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32.

⑤ 会后结集出版了同名论文集, 参见 Paolo Bernardini and Norman Fiering, eds., *The Jews and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to the West, 1450 to 1800*,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1.

戴维肯·基兹伯特分别对荷兰殖民帝国和伊比利亚殖民帝国境内塞法尔迪犹太人进行了系统研究。^①综合来看，国际学术界的现有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对塞法尔迪群体本身的分析（通常以某个特定区域、某个城市或某个家族为例），^②而对该群体之于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作用、与犹太社会现代转型的关系等方面缺乏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全球史视角，在充分吸收国际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港口犹太人及其贸易网络为切入点，分析现代商业社会特征在该群体中间的出现，进而以此为基础，探究在哈斯卡拉运动之外犹太社会内部孕育现代性的另一条路径。

一、“港口犹太人”概念的提出

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港口自古以来即是多种文明、宗教和民族的交汇之地，也是货物、人群及思想交流的重要场所，尤其在地理大发现后海洋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活动舞台，“城市港口或港口城市，是现代欧洲空间经济的核心要素之一，象征着文化多样性与历史性经历的融合”。^③港口凭借其与海洋之间的天然联系，充当着不同文明之间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史和海洋史研究的蓬勃发展，海洋贸易、商业网络、跨文化交流等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议题，受其影响，

① 参见 Jonathan I. Israel, *Diasporas within a Diaspora: Jews, Crypto-Jews, and the World Maritime Empires (1540-1740)*, Leiden: Brill, 2002; Daviken Studnicki-Gizbert, *A Nation upon the Ocean Sea: Portugal's Atlantic Diaspora and the Crisis of the Spanish Empire, 1492-16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例如，Esther Benbassa and Aron Rodrigue, *Sephardi Jewry: A History of the Judeo-Spanish Community, 14th-20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Daniel M. Swetchinski, *Reluctant Cosmopolitans: The Portuguese Jews of Seventeenth-Century Amsterdam*, London: The Littman Library of Jewish Civilization, 2000; Mordechai Arbell, *The Jewish Nation of the Caribbean: The Spanish-Portuguese Jewish Settlements in the Caribbean and the Guianas*, Jerusalem: Gefen Publishing House, 2002; Francesca Trivellato, *The Familiarity of Strangers: The Sephardic Diaspora, Livorno, and Cross-Cultural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Jessica V. Roitman, *The Same But Different? Inter-Cultural Trade and the Sephardim, 1595-1640*, Leiden: Brill, 2011. 仅有的例外是，约瑟夫·卡普兰以西欧的塞法尔迪群体为例，探讨了塞法尔迪人与犹太社会通向现代的另一条道路之间的关系，参见 Yosef Kaplan, *An Alternative Path to Modernity: The Sephardi Diaspora in Western Europe*. 实际上，这些现代特征不仅限于西欧的塞法尔迪人，而在整个塞法尔迪流散地（尤其是在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的诸多港口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

③ B. S. Hoyle and D. A. Pinder, *European Port Cities in Transition*, London: Belhaven Press, 1992, p. 1.

从事近代早期犹太流散社团研究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时期主要生活在大西洋港口地区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在此情况下,“港口犹太人”(Port Jews)概念正式被提出。

虽然自古以来就有不少犹太人生活在港口地区,但“港口犹太人”这一术语的出现和使用是比较晚近的现象。^①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港口犹太人”的提法最初由学者路易丝·杜宾(Lois C. Dubin)和大卫·索金(David Sorkin)在1999年提出,^②前者首次组合了这一词组,后者对其内涵进行了系统阐发。“港口犹太人”的概念一经提出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强烈兴趣,学者们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③

具有特定内涵的港口犹太人,是指1492年西班牙大驱逐后到18世纪末活跃在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乃至太平洋海域,主要从事跨地区海洋贸易的犹太人群体。从人口构成上看,港口犹太人主要来自从伊比利亚半岛迁出的塞法尔迪人及其后裔,由犹太人、马兰诺以及新基督徒^④三大群体构成。这些群体的出现主要与14世纪末到15世纪末伊比利亚半岛的反犹浪潮,尤其是与1492年西班牙大驱逐运动密切相关。^⑤

-
- ① 很大程度上,“港口犹太人”的概念是相对于宫廷犹太人(Court Jews)而言的。在德文中,宫廷犹太人为“Hofjuden”,而港口犹太人为“Hafenjuden”。宫廷犹太人主要活跃在绝对主义时期(17、18世纪)的中欧君主制国家,以从事金融、承包等经济活动著称。参见 Selma Stern, *The Court Jew: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Period of Absolutism in Central Europe*, trans. Ralph Weiman,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50.
- ② Lois C. Dubin, *The Port Jews of Habsburg Trieste: Absolutist Politics and Enlightenment Cultur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David Sorkin, “The Port Jew: Notes Toward a Social Type,”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vol. 50, no. 1 (Spring 1999), pp. 87-97.
- ③ 2001—2005 年,南安普顿大学帕克斯研究所启动“港口犹太人研究项目”(Port Jews research project); 2001 年与 2003 年,围绕这一主题先后在南安普顿大学和开普敦大学举行了两次大型学术研讨会,并在会后出版了论文集。有关这两次学术会议的论文集,参见 David Cesarani, ed., *Port Jews: Jewish Communities in Cosmopolitan Maritime Trading Centres, 1550-1950*, London: Frank Cass, 2002; David Cesarani and Gemma Romain, eds., *Jews and Port Cities 1590-1990: Commerce, Community and Cosmopolitanism*, London: Vallentine Mitchell, 2006.
- ④ 1391 年从塞维利亚开始的伊比利亚半岛强制改宗浪潮,致使大批犹太人皈依基督教,这群规模浩大的改宗者随后被称为“新基督徒”(cristiano nuevo); 而不少改宗者虽对外宣称基督徒但私下仍秘密遵守犹太教的生活方式,这些秘密犹太人基督徒贬称作“马兰诺”(Marranos)。
- ⑤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马兰诺问题、切断其与犹太人的联系,1492 年 3 月 31 日,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与伊萨贝拉联合签发驱逐犹太人的法令(Alhambra Decree),限令王国领地上的所有犹太人必须在 4 个月之内离开,是为“1492 年大驱逐”事件(The Expulsion of 1492)。据估计,此次大驱逐导致大约 20 万犹太人被迫离开西班牙,其中约有 12 万人进入邻近的葡萄牙王国。

1492 年大驱逐后，西班牙犹太人的外迁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向东进入地中海区域，主要是伊斯兰统治下的北非以及奥斯曼帝国，也包括威尼斯、利沃诺等意大利城市公国；另一条是进入葡萄牙、法国以及北欧国家，该分支随后又经历多次人口迁移，许多人随欧洲殖民者的扩张而散布在大西洋、印度洋等地的港口。

有关港口犹太人群体的具体人数，学术界尚未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从人口比例上看，中古与近代早期绝大部分的犹太人为塞法尔迪人。据统计数字，1300 年塞法尔迪人口为 140 万左右（占当时世界犹太总人口的 93%），此后伊比利亚半岛的强制皈依运动，导致塞法尔迪人口数量和占比有所下降，1500 年塞法尔迪人口为 100 万左右（占犹太总人口的 67%），1650 年塞法尔迪人口仍为 100 万（占犹太总人口的 59%）；直到 1700 年阿什肯纳兹人口总数才与塞法尔迪人口总数持平，各为 100 万左右。^①考虑到塞法尔迪人占据近代早期世界犹太总人口的大多数，以及不少马兰诺和新基督徒由于担心遭到宗教裁判所迫害而通常隐藏自己的身份，因此保守估计，参与各类殖民扩张与国际贸易活动的港口犹太人至少占当时犹太总人口的 1/3 以上，在鼎盛期甚至达到一半。^②

归结起来，学术界对“港口犹太人”的概念有以下基本界定。第一，通常与 1492 年西班牙大驱逐后的塞法尔迪人及其后裔密切相关，生活在港口地区的其他犹太人通常不被认可为港口犹太人。第二，定居在港口并具有空前频繁的流动性，他们在不同的港口之间穿梭往来，从事着活跃的跨地区商业活动。第三，港口犹太人的活动范围空前广阔，包括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乃至太平洋（东南亚、东亚部分地区）^③ 的众多港口和殖民地。第四，形成了跨地区的贸易网络，许多港口犹太人家族及其分支遍布在不同的港口并相互联系。第五，主要从事殖民地贸易，这是犹太人随着大航海时代到来而出现的新现象。

自从大流散以来，犹太人与其他民族有着频繁的交往与互动。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14 世纪之间，犹太人一直活跃在东西方陆路贸易上，成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维系者与受益者之一。散居民族所独有的国际化品质与世界商人的特殊禀赋使他们能够以丝绸之路为舞台，穿梭于波斯文明、罗马文明、拜占庭文明、基督教文明、

① 参见 Dean Phillip Bell, *Jew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Plymouth: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p. 36.

② David Cesarani, "Port Jews: Concepts, Cases and Questions," *Jewish Culture and History*, vol. 4, no. 2, 2001, p. 5.

③ 随着欧洲殖民势力向东扩张，19 世纪中期至 20 世纪初，一些塞法尔迪商人将其贸易网络扩展至远东地区，因而这一时期新加坡、马尼拉、香港、上海等港口的犹太人通常也被纳入港口犹太人的范畴。参见 Jonathan Goldstein, "The Sorkin and Golab Theses and Their Applicability to South, Southeast, and East Asian Port Jewry," *Jewish Culture and History*, vol. 4, no. 2, 2001, pp. 179-196.

伊斯兰文明、突厥文明以及中华文明之间，成为沟通不同文明的桥梁与纽带。大航海时代到来后，犹太人又积极探索新航道、参与殖民活动，尤其参与到连接新旧世界的全球性贸易之中，而“港口犹太人”正是犹太民族融入大航海时代的重要体现。作为全球史和海洋史研究的重要案例，“港口犹太人”概念的提出是犹太史经历全球史转向的重要体现。有学者指出，“港口城市和城镇在欧洲对外扩张和全球贸易体系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考虑到犹太商人在近代早期海外商业中的地位以及大西洋史和港口犹太人研究中对跨国网络的强调，是时候将这两种视角（即犹太史和全球史）结合起来。……以海洋为舞台，港口犹太人连接着遥远的社团……对港口犹太人的研究，为犹太史研究增添了一种跨民族、跨海洋与全球的视角。”^①

二、大航海时代与港口犹太人贸易网络

从 15 世纪中叶到 16 世纪末在世界历史上通常被称为“大航海时代”。这一时期是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由孤立走向联系的关键时期，也是全球经济网络勃兴的时代。地理大发现打破了新旧大陆之间的孤立状态，揭开了欧洲、非洲与美洲之间系统性交往的序幕，不仅传统意义上的商品、人员、技术，而且食物、观念以及疾病等，都在新旧世界之间进行着密集的传播，这种由哥伦布远航开始的洲际性交往通常被学者们称为“哥伦布交往”（Columbian Exchange）。^②随着欧洲殖民活动的不断扩张，美洲、非洲、亚洲等都逐步被纳入到正在形成的世界体系中。

地理大发现作为欧洲殖民扩张活动的历史性起点，犹太人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西班牙颁布驱逐犹太人法令两周后的 1492 年 4 月 17 日，西班牙统治者正式批准了哥伦布向西远航前往“印度”的大胆计划。哥伦布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颁布敕令驱逐全部犹太人的同月，国王和女王陛下命令我带领足够的人员启程去印度探险。”^③8 月 3 日，当所有犹太人都已离开西班牙时，停靠在帕洛斯港的三艘舰船在哥伦布指挥下启程奔向未知世界。应该说，这两大事件并非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许多犹太人和马兰诺为远航提供了资金、技术及人员方面的前期准备，而且他们还有人直接参与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远航。^④

在新旧世界连成一体的情况下，贸易网络成为开展跨洲际交往的重要载体。

① Lois Dubin, “Introduction: Port Jews in the Atlantic World ‘Jewish History’,” *Jewish History*, vol. 20, no. 2, 2006, pp. 118, 125.

② Alfred W.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ublishing Co., 1972.

③ 转引自 Cecil Roth, *A History of the Marranos*, p. 271.

④ 参见 Meyer Kayserling, *Christopher Columbus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Jews in the Spanish and Portuguese Discoveries*,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Co., 1894.

1492 年西班牙大驱逐后，许多犹太人跨越大西洋，参与到殖民扩张活动中。通过散布在新旧世界各地的犹太商人及其代理人，港口犹太人穿梭在新旧大陆之间开展着频繁的贸易交往，在此基础上，连结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等地的全球性贸易网络逐渐成形。该贸易网络主要由塞法尔迪人及其后裔所构成，它通常也被称为塞法尔迪贸易网络（Sephardic trading networks）。到 17 世纪中叶，港口犹太人贸易网络进入鼎盛期，港口犹太人以各大主要港口为中心，将其贸易活动范围扩展至当时几乎所有的欧洲强国及其殖民地，从而在欧洲殖民扩张以及全球经济交往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港口犹太人贸易网络的形成，有着两大关键性前提：对宗教迫害的恐惧（伊比利亚半岛的宗教迫害导致大批犹太人外迁）与对经济机会的向往（重商主义带来的经济机会吸引着犹太人）。它们是塞法尔迪人大规模流动的根本动力，前者是推力而后者是拉力，二者构成犹太人海外扩张的两大动力引擎，共同推动着港口犹太人贸易网络从地中海扩展至大西洋、印度洋乃至太平洋。根据主要活跃地区和兴起时间来界定，港口犹太人贸易网络大致可以分为伊比利亚殖民体系（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荷兰殖民体系、英法殖民体系^①以及印度洋与远东地区几大部分。

在伊比利亚殖民体系时期，许多新基督徒家族以里斯本与塞维利亚为基地，与西北欧、地中海的港口城市以及美洲殖民地（巴伊亚、韦拉克鲁斯、巴拿马、基多、利马、波托西、布宜诺斯艾利斯、卡塔赫纳以及葡属巴西）之间开展着频繁的商业往来，进口蔗糖、烟草、香料与宝石等殖民地原材料，向殖民地出口制成品，从而形成“地域广阔、层级分明且联系密切”^②的贸易网络。著名的马兰诺家族门德斯家族（House of Mendes）在 16 世纪的欧洲商业和金融领域有着重要影响，垄断了当时里斯本与北欧地区的香料和胡椒贸易，与德意志的富格尔家族、意大利的洛梅利尼家族（Lomellini）并称为当时欧洲的三大商业和金融家族。该家族一开始以葡萄牙为基地，1512 年在安特卫普建立分支，随后又扩展到意大利半岛的威尼斯、费拉拉以及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等地，该家族与当时欧洲的主要君主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奥斯曼帝国等）都有着密切的借贷关系并在当地设有代理人。

从 17 世纪中叶起，港口犹太人贸易网络在英法殖民体系下得到快速发展，并在殖民地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牙买加、巴巴多斯、北美、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圣多明各等地具有较大影响。牙买加犹太人主要从事与其他西印度殖民地的

① 近代早期的西方殖民扩张通常分为两大体系——以西班牙、葡萄牙为主的伊比利亚体系（Iberian system）和以荷兰、英国、法国为主的西北欧体系（Northwest European system）。参见 Pieter Emmer, “The Two Expansion Systems in the Atlantic,” *Itinerario*, vol. 15, no. 1, 1991, pp. 21-27.

② Daviken Studnicki-Gizbert, *A Nation upon the Ocean Sea: Portugal's Atlantic Diaspora and the Crisis of the Spanish Empire, 1492-1640*, p. 94.

贸易，比如巴西木、胡椒、可可、蔗糖等，他们还几乎垄断了当地的香草和甘椒贸易，随后又转向靛蓝、染料、棉花与纺织品贸易。^①来自巴西的犹太难民为巴巴多斯带来了蔗糖生产与精炼技术，使该岛成为加勒比地区的主要产糖岛屿之一。^②法属马提尼克的蔗糖业也得益于犹太人。1685 年，马提尼克拥有 172 座蔗糖作坊，其中近 1/3 属于犹太人。^③犹太人还积极参与到欧洲殖民者的海盗活动中，在牙买加等加勒比海地区十分活跃。^④

就规模和影响而言，港口犹太人在荷兰殖民体系下最为活跃，他们卷入荷兰殖民扩张活动的程度也最深。17 世纪初，奉行重商主义和宗教宽容政策的荷兰尤其是阿姆斯特丹，吸引了大批遭受宗教裁判所迫害的新基督徒前来定居，许多新基督徒进入当地后开始公开皈依犹太教。塞法尔迪人在荷兰对外殖民扩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从事奴隶、蔗糖、烟草、钻石等跨大西洋贸易的枢纽与中心。^⑤1630 年荷兰从葡萄牙手中夺取巴西，吸引大批犹太人前来定居。荷属巴西的主要港口累西腓一度拥有当时美洲最大规模的犹太社团。1644 年，荷属巴西达到繁荣的顶点，大约有 1450 名塞法尔迪犹太人，占当地白人的一半以上。^⑥1654 年，巴西被葡萄牙人重新夺取后，许多犹太人前往荷属苏里南、库拉索，他们的到来改变了这些岛屿的经济状况，使之成为中美洲地区的重要港口要冲。到 1726 年，库拉索的塞法尔迪人拥有超过 200 艘商船，控制了该岛绝大部分航运业，与美洲的众多港口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⑦他们在库拉索进行交换的商品种类有可可、烟草、兽皮、蔗糖、咖啡、靛蓝、小麦、面粉以及豌豆等。^⑧苏里南则一度拥有美洲最大的犹太社团，人口最多时超过 3 千人。在美洲犹太人口重新流动的过程中，北美大陆

① Mordechai Arbell, *The Portuguese Jews of Jamaica*, Kingston: Canoe Press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2000, p. 48.

② Harry A. Ezratty, *500 Years in the Jewish Caribbean: The Spanish and Portuguese Jews in the West Indies*, Baltimore, MD: Omni Arts, 1997, p. 59.

③ Mordechai Arbell, "Jewish Settlements in the French Colonies in the Caribbean (Martinique, Guadeloupe, Haiti, Cayenne) and the 'Black Code'," in Paolo Bernardini and Norman Fiering, eds., *The Jews and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to the West, 1450 to 1800*, p. 291.

④ 参见 Edward Kritzer, *Jewish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New York: Doubleday, 2008.

⑤ 17 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也是欧洲乃至世界塞法尔迪人的中心和“母亲社团”（mother community），被誉为“荷兰的耶路撒冷”（Dutch Jerusalem）。

⑥ Arnold Wiznitzer, "The Number of Jews in Dutch Brazil (1630-1654),"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16, no. 2 (April 1954), p. 111.

⑦ Isaac S. Emmanuel and Suzanne A. Emmanuel, *A History of the Jews of the Netherlands Antilles*, vol. 1, Cincinnati: American Jewish Archives, 1970, p. 681.

⑧ Wim Klooster, "The Jews in Suriname and Curaçao," in Paolo Bernardini and Norman Fiering, eds., *The Jews and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to the West, 1450 to 1800*, p. 356.

迎来了最早的一批犹太人。1654年9月,23名原居巴西的葡萄牙犹太人为躲避宗教裁判所的迫害来到了荷属新阿姆斯特丹,成为向美国移民的先驱。^①

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全球扩张,不少塞法尔迪人作为翻译、航海向导或代理人进入东方从事商业活动,并积极参与东印度公司的殖民活动,他们的足迹沿着西非、阿拉伯海、印度次大陆、孟加拉湾等海岸扩展,印度洋贸易沿线的主要港口城市(例如霍尔木兹、科钦、果阿、孟买、马六甲等)都成为犹太商人的重要据点。特别是从16世纪开始,苏拉特、科钦、果阿、卡利卡特、卡朗格努尔(Cranganore)、马德拉斯、圣托马斯等印度沿海港口都存在一定规模的犹太社团。此外,霍尔木兹、马斯喀特、锡兰、马六甲、暹罗、马尼拉等都活跃着塞法尔迪犹太商人。^②早期进入印度洋地区的塞法尔迪人从事各种贸易。路易斯·罗德里格斯(Luis Rodrigues)从霍尔木兹进口马匹运输到科摩林角(Cape Comorin),他的船只前往纳加帕蒂南(Negapattanam)、麦拉坡(Mylapore)、锡兰、马六甲、勃固(Pegu,今缅甸)等地;他将孟加拉、锡兰与马六甲的商品运到科钦出售,并将武器弹药转售给当地的统治者。^③除商业领域以外,当地的许多港口犹太人还充当着西方殖民者的外交代理人。由于他们出色的语言能力、在当地的社会影响以及与土邦王公、苏丹的密切关系,许多塞法尔迪人被赋予政治和外交代理人的角色。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著名的沙逊家族(the Sassoons)凭借家族网络,建立起横跨亚洲大陆的庞大商业帝国,其分支遍布加尔各答、孟买、香港、上海等地。沙逊家族也因此被誉为“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the Rothschilds of the East)。^④

到18世纪下半叶,港口犹太人及其贸易网络在许多因素的压力下逐步走向衰落。这一时期由于西葡两国持续实行压制政策,结束了伊比利亚半岛新基督徒和米兰诺的外迁浪潮,导致港口犹太人失去了新鲜血液,并且与伊比利亚半岛的亲族关系网络也被切断。更为关键的是,随着重商主义走向没落、荷兰霸权的结束,严重依赖重商政策的塞法尔迪贸易网络随之趋于衰落。^⑤特别是进入18世纪中叶以后,

① 港口犹太人在早期北美犹太社团中占据主要地位,几乎每个有组织的犹太社团——萨凡纳、查尔斯顿、费城、纽约与纽波特的犹太社团——都是在港口城市中发展起来的。

② Walter J. Fischel, "The Indian Archives: A Sourc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of Asia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on),"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vol. 57, 1967, p. 195.

③ Kenneth X. Robbins, "Jews, New Christians, and the Portuguese on the South Malabar Coast," in Kenneth X. Robbins and Marvin Tokayer, eds., *Western Jews in India: From the Fif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New Delhi: Manohar, 2013, p. 98.

④ Cecil Roth, *The Sassoon Dynasty*, London: Robert Hale, 1941, p. 11.

⑤ 有学者强调港口犹太人与荷兰商业霸权之间的密切联系:“塞法尔迪人在西欧处于支配地位的时期与荷兰在17世纪的活力相一致并部分地依赖于后者。一个世纪以后,欧洲贸易模式转移导致荷兰霸权的结束,将荷兰变成二流强国,而阿姆斯特丹的塞法尔迪显赫商人家族也随之衰落,正如相互联系的波尔多、汉堡、威尼斯与伦敦塞法尔迪

由于工业革命的开展，制造业取代商业成为国际经济的动力引擎，导致以从事商品运输与转卖为主的港口犹太人贸易网络失去活力。此外，导致港口犹太人及其贸易网络走向衰落的原因还有：阿姆斯特丹及其他港口犹太人的贫困不断加剧；在外部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塞法尔迪流散地出现了很高的同化率。^①

在没有国家这一载体为商业机构及其活动提供保障的情况下，港口犹太人跨越宗教与民族界限，在欧洲强国及其殖民地开展跨地区贸易，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建立并维系全球性海洋贸易网络达三个世纪之久。港口犹太人先后参与到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重商主义等近代史上一系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活动中，成为殖民扩张与海外贸易的中坚力量，因此被视为“欧洲殖民扩张中无价的代理人”。^② 乔纳森·以色列指出，“西方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在从 1492 年发端到 18 世纪末的欧洲海洋、商业与殖民扩张中充当了十分特别或许是独一无二的角色。……在大规模全球扩张活动中，塞法尔迪犹太人与具有伊比利亚背景的秘密犹太人以实质性方式，对西方主要商业中心在国际贸易、航运与金融业中不断增强的主导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对当时的六大海洋帝国——威尼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的贡献也引人注目。”^③

三、港口犹太人与现代商业社会特征的成长

在频繁参与跨地区贸易的过程中，港口犹太人及其社团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商业社会的形态，其呈现方式不同于传统犹太商人的个体性特征，而是以网络形式大规模扩展。通过与非犹太人在许多领域的密切交往，港口犹太人逐渐打破了传统犹太社团的结构，具备了现代社会的诸多特征。索金指出：“与宫廷犹太人和马斯基尔一

社团一样。塞法尔迪人因而沦为不断趋于边缘的地位。”参见 Jane S. Gerber, *The Jews of Spain: A History of the Sephardic Experie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pp. 181-182.

① Jonathan I. Israel, *Diasporas within a Diaspora: Jews, Crypto-Jews, and the World Maritime Empires (1540-1740)*, pp. 38-39.

② Noah L. Gelfand, “A People Within and Without: International Jewish Commerce and Communit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Dutch Atlantic World,” Ph. D. Dissert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2008, p. 6. 历史资料证明，港口犹太人直接和间接地充当了殖民扩张活动的先驱者和代理人角色，积极参与了以奴隶贸易和海盗贸易等为代表的殖民活动，这些殖民掠夺行为给所到之处带来的负面影响与破坏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正是通过这些活动，犹太人扩展了自身的国际商业联系，其社团内部的商业特性也得以进一步成长。

③ Jonathan I. Israel, *Diasporas within a Diaspora: Jews, Crypto-Jews, and the World Maritime Empires (1540-1740)*, p. 1.

样，港口犹太人都源自向西的移民。但不同于那两种阿什肯纳兹类型的是，港口犹太人受益于商业城市和商业社会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当宫廷犹太人扭曲了自治社团（中古犹太生活的特征）的边界时，港口犹太人已经以商业公司或自愿社团的形式生活在自治社团之外。”^①

（一）空前的流动性与亲族关系网络

近代早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口与商品出现了空前的流动性（mobility）。流动性是塞法尔迪犹太人的首要特征。地理大发现后，散居在各地的港口犹太人的流动人口趋势前所未有，他们是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移民，以家族和婚姻联结而成的亲族关系（kinship）为纽带开展商业活动。斯威特齐尼斯基强调，“商业与亲族关系之间的关系如同鸡与蛋的关系一般”。^②港口犹太人在维系和加强相互之间的信任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他们基本都源自伊比利亚半岛，有着共同的血缘与亲族关系，而且对犹太教古老的遗产有着共同的认知，不存在语言沟通障碍（他们都懂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这些家族及其散布在各地的分支所形成的贸易网络，为塞法尔迪人商业上的成功提供了重要前提。布罗代尔在其《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写道：“他们（犹太人）建立了世界的最主要的商业网，因为他们遍布全球，在落后地区或者不发达地区充当手工业者、店主或者当铺老板。在主要城市里，他们参与促进这些城市的经济的勃兴和商业的繁荣。”^③

亲族关系使得同一家族在不同的经济生活中心扎根，并在各地建立起许多商业分支，在全球至少两个地方拥有立足点的犹太商业公司可能数以百计乃至千计。例如，洛佩斯家族（the Lopez family）的中心位于波尔多，但在西班牙、英格兰、安特卫普与图卢兹都有分支；著名的加迪斯家族（the Gradis）同样来自波尔多，在法属殖民地马提尼克、圣多明各等都有分支；卡塞尔家族（the Carceres）分布在汉堡、英格兰、奥地利、西印度群岛、巴巴多斯与苏里南；其他有着世界范围分支的著名家族有科斯塔家族（the Costas）、科内利亚诺家族（the Coneglianos）、阿尔哈迪比家族（the Alhadibs）、沙逊家族、皮埃尔家族（the Pereires）、罗斯柴尔德家族（the Rothschilds）等。可以说，这些塞法尔迪犹太商业家族是“跨国公司”的雏形。^④塞

① David Sorkin, “The Port Jew: Notes Toward a Social Type,” p. 97.

② Daniel M. Swetchinski, “Kinship and Commerce: The Foundations of Portuguese Jewish Life in Seventeenth-Century Holland,” *Studia Rosenthaliana*, vol. 15, no. 1 (March 1981), p. 73.

③ 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2卷，吴模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50页。

④ Sam N. Lehman-Wilzig,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Prototype of the 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40, no. 3/4 (Summer-Autumn 1978), pp. 251-270.

西尔·罗斯强调，这种亲族关系构成的网络为塞法尔迪人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极大便利：“他们（塞法尔迪犹太人）在西欧贸易中发挥了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重要作用。同样的语言和同样的文化遍布于每个港口或大或小的圈子之中。某个人从汉堡到波尔多，从波尔多到利沃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以同样的语言进行的通信在半个以上的文明世界开展。绝大多数的重要家族是国际性的，其成员定居在每个大型中心。因而，从字面来说，‘信用’就是一种社会实际，它自动地支持着社会交往”。^①

这种基于血脉关系之上的跨地区联系，成为港口犹太人开展跨地区商业活动的天然便利条件。耶鲁沙尔米分析道：“他们（塞法尔迪人）之间的这种联系超越了区分基督徒与穆斯林世界、或者新教与天主教国家的宗教和地缘政治界限。这种国际性凝聚力至少成为塞法尔迪人商业成功的主要根源之一。”^②

（二）“全球族”跨文化群体属性的塑造

自古以来犹太人多选择在商业要道定居，作为商人和货物集散人，在货物、信息等方面都领先于其他商人群体。当代学者乔尔·科特金将犹太人视为影响人类发展的五大全球化部族（global tribes）之一，并归纳了全球化部族的三大共性特征：具有强烈的族裔认同感和共同依存意识；具有一个以共同信任为基础的全球网络；具有一种执著地从所有可能得到的资源中获取技术和其他知识的能力。^③在近代早期的港口犹太人那里，这种“全球族”的跨文化群体属性尤为显著，他们充当着不同民族之间“互相交流的媒介”。1712 年 9 月 27 日的《观察者》这样描述道：“他们（犹太人）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大贸易地区，成了相距最遥远的民族之间互相交流的媒介，人类通过他们得以普遍联络起来。他们仿佛嵌在大楼中的木栓和钉子，尽管本身价值微不足道，但对于整个架构的维持，却绝对必需。”^④

“全球族”的群体属性赋予港口犹太人独特的“中间人身份”（middlemen），这种既在其中、又在其外的中间人身份使之充当着本地与外部进行商业交往的桥梁，从而为犹太人从事国际交往并建立贸易网络提供了独特条件。在近代早期殖民扩张初期，由于西方殖民者对美洲以及东方的知识十分有限，亟需了解外部世界的地理和情况，而许多犹太人、马兰诺和新基督徒参与到翻译、代理人、顾问和航海向导

① Cecil Roth, *A History of the Marranos*, p. 233.

② Yosef H. Yerushalmi, “Between Amsterdam and New Amsterdam: The Place of Curaçao and the Caribbean in Early Modern Jewish History,” *American Jewish History*, vol. 72, no. 2 (December 1982), pp. 177-178.

③ 乔尔·科特金：《全球族：新全球经济中的种族、宗教与文化认同》，王旭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序言”，第 2、4 页。

④ Seymour Liebman, *New World Jewry, 1493-1825*, New York: Ktav Publishing House, 1982, p. 189.

等职业中,^① 主要是由于他们出色的语言能力以及他们与其他地区的广泛联系所致。有学者这样评价犹太翻译的作用, 他们“扩展了家族与社团的网络……使之成为出色的使者和密探”。^②

作为“全球族”的另一重要体现, 跨文化交往在港口犹太人中间频繁发生, 从而使之具备了出色的文化柔韧性。犹太人在长期流散生活中发展起来的社交能力与环境适应力是超群的, 他们精通许多民族的语言, 善于判断当地的行情, 他们特有的文化柔韧性使其灵活周旋于不同群体之间, 这种特征是散居犹太人基本都有的共性, 但在港口犹太人那里尤为显著。正是由于港口犹太人出色的文化柔韧性, 他们才得以跨越宗教与民族的界限而在主要殖民帝国及其殖民地范围内开展跨地区贸易活动: “尽管伊比利亚的宗教裁判所以及其他地方不时发生许多骚扰, 但塞法尔迪人作为近代早期世界最重要的‘跨文化掮客’(cross-cultural brokers) 而出现: 他们独自成功地将所有西方的海上帝国、所有大陆以及所有对立的主要宗教集团连接起来”。^③

(三) 商业价值的主导地位

很大程度上, 港口犹太人由于其商业价值而为当地社会所接纳, 他们与重商主义的发展相辅相成。一方面, 在许多重商主义统治者看来, 拥有雄厚资本实力以及广泛经济联系的港口犹太人是一股不容忽视的经济力量, 因而积极招徕从事海外贸易的犹太人前来定居。另一方面, 港口犹太人是重商主义时代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重商主义环境使他们的商业才能得以充分施展。由于与重商主义的环境密切相关, 港口犹太人及其贸易网络在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得到了迅速发展, 尤其与荷兰的商业霸权联系比较紧密。推行重商主义的荷兰积极接纳塞法尔迪人进入其境内以及殖民地定居, 因而塞法尔迪人在荷兰殖民体系下最为活跃, 阿姆斯特丹也成为当时塞法尔迪世界的中心。而港口犹太人为荷兰带来了发展商业所需的巨额资本与广泛联系, 从而造就了荷兰在 17 世纪国际商业中的霸权地位, 出现了所谓的“荷兰黄金时代”, 这个时期也正是港口犹太人的鼎盛期。正是基于重商主义对于港口犹太人

① 许多塞法尔迪人从事翻译、代理人、顾问和航海向导等职业。例如, 哥伦布远航舰队的翻译路易斯·德·托雷斯、达伽马远航舰队的翻译兼航海向导加斯帕尔 (Gaspar)、葡萄牙王室在尼德兰联省的代理人达·科斯塔家族、摩洛哥王室的欧洲代理人兼顾问撒母耳·帕拉赫 (Samuel Pallache)、英属东印度公司外交代表亚伯拉罕·纳瓦罗 (Abraham Navarro), 等等。

② Dejanirah Couto, “The Role of Jewish and New Christian Interpreters, or *Linguas*, in the Portuguese Empire During the 16th Century,” *e-Journal of Portuguese History*, vol. 1, no. 2 (Winter 2003), p. 4.

③ Adam Sutcliffe, “Sephardic Amsterdam and the Myths of Jewish Modernity,”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vol. 97, no. 3 (Summer 2007), p. 419.

的重要作用，有学者将之称为“亲犹的重商主义”（Philosemitic Mercantilism）。^①

正是港口犹太人的商业价值（包括大量财富与广泛联系），使之成为国际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港口犹太人的大规模流动往往伴随着财富与商业联系的转移，他们的人口迁移同时也是“资本的迁出”（*exodo de capitaes*），^②成为国际经济中此消彼长的关键性少数。1671 年 12 月 17 日，一封由牙买加总督写给英国枢密大臣的信，充分强调了犹太人的商业价值，“没有其他臣民可以比犹太人更能让国王陛下获利：他们拥有大量的货物与广阔的通信”。^③查尔斯·达利（Charles P. Daly）也强调：“他们（塞法尔迪人）被从其他职业驱赶出来，而不得不将其精力转向贸易。他们的世界主义特质使之观察到什么是推动国际贸易所需要的东西。他们的迅速与机敏帮助其发现如何促进贸易。”^④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港口犹太人的商业地位还体现在参与并促成了国际商业重心从伊比利亚向西北欧转移的过程。如前所述，在伊比利亚殖民体系时期，由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宗教迫害，许多马兰诺与新基督徒前往西葡在美洲的殖民地，^⑤使美洲经济成为大西洋经济的活力源泉。进入西北欧殖民体系时期，荷兰的宗教宽容与重商政策吸引了大批犹太人前来定居，促使阿姆斯特丹在 17 世纪成为国际商业的中心。布罗代尔指出，“作为经验丰富的商人，犹太人自然地倾向于繁荣的经济。他们进入某个国家，通常意味着当地经济的发达或发展。而如果他们离开，虽然并不都意味着当地经济的不景气，但至少可能不是那么繁荣。”^⑥学者桑巴特也强调，塞法尔迪人的国际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生活中心的转移”：“以色列人如同太阳一般掠过欧洲上空：他们到来，万物复苏；他们离去，万物凋零。犹太民族自 15

① Jonathan I. Israel, *European Jewry in the Age of Mercantilism, 1550-1750*, London: The Littman Library of Jewish Civilization, 1998, p. 93.

② 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艾仁贵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年，第 127 页。

③ M. Kayserling, “The Jews in Jamaica and Daniel Israel Lopez Laguna,”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vol. 12, no. 4 (July 1900), p. 710.

④ Oscar Reiss, *The Jews in Colonial America*, Jefferson, N. C.: McFarland & Co., 2004, p. 155.

⑤ 对犹太人的大驱逐运动是导致西班牙王国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当时就有人意识到犹太人之于西班牙经济的重要作用，安东尼奥修士发出警告说：“（驱犹运动）将不仅使这个王国失去人口，而且将使之贫困，因为他们（犹太人）通过其财富使我们的敌人富裕起来。”参见 Michael Alpert, *Crypto-Judaism and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London: Palgrave, 2001, p. 57.

⑥ 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trans. Sian Reynolds, vol. 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 187.

世纪以来命运变迁的简要历史将会支持这种论点”。^①具体来说，他们的迁移成为西葡衰落而荷英崛起的关键：“16 世纪末，西班牙及葡萄牙的犹太人定居到其他国家。正是在这个时期，比利牛斯半岛经济发展的厄运被注定了。……另一方面，有时颇难预料的是，这些难民逃往的国家和城市的经济重要性得到了提升，这种现象肯定要追溯至西班牙犹太人在当地的首次出现”，接着他又以荷兰和英国的崛起为例来说明塞法尔迪犹太人的到来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众所周知，荷兰于 16 世纪末突然崛起（从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说）。1593 年，首批葡萄牙马兰诺定居于阿姆斯特丹，不久，他们的人数迅速增加。……英国的情况也大致类似。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犹太人的涌入如影随形，而这些犹太人主要来自西班牙与葡萄牙”。^②

（四）现代经营手段与信用工具的运用

近代早期散居在各地的港口犹太人虽然数量并不多，但他们几乎在各个主要港口都有贸易据点，这主要得益于塞法尔迪商人运用了一系列现代经营手段和信用工具。从中古晚期开始，为了分担商业风险和维持商业合作，在热那亚、威尼斯等意大利城市地区从事远程贸易的商人中间发展起了一系列新式经营手段和信用工具，包括代理人制、合伙制、海上保险、汇票，等等。散居在意大利地区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借助这些经营手段和信用工具，同时又对其进行一定的革新和改进，并推广开来，这些经营手段和信用工具的运用不仅使分散在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乃至太平洋等广阔区域的港口犹太人贸易网络的运作变得积极有效，并且促进了近代早期国际贸易的便利化。具体来说，以塞法尔迪人为主体的港口犹太人在现代经营手段和信用工具的使用与推广上主要有以下建树。

第一，革新代理人制度。在经营手段上，塞法尔迪人以亲族关系为基础建立起发达的代理人机制（*fattoria*）。^③代理人提供各种与商业有关的服务，例如装货和卸货、支付关税和运费、将货物运往市场、在信用期限内出售商品，等等。代理活动可以很大程度地降低商业风险和成本，它是中古与近代早期远程贸易的重要形式。代理人通常不对货物的经济损失负责，从雇主那里领取固定薪水，因而他们对雇主是否获得高额利润兴趣不大。而 16 世纪的塞法尔迪犹太商人在代理人制度中引入一项重要变革，他们废除了薪水制度，根据交易额的一定比例来支付薪水，这就调动

① 参见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第 9 页。

② 参见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第 10—11 页。

③ Shelomo D. Gotein,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The Jewish Communities of the Arab World as Portrayed in the Documents of the Cairo Geniza*, vol. 1: *Economic Foundations*,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 166.

了代理人的积极性，使之努力出售商品以提高收益。^①此外，塞法尔迪犹太商人还在许多港口城市设立商业领事（commercial consuls），^②负责接收和保管商人运来的货物，并按指令将货物运往目的地。通过商业领事，商人无需处理商品的转运问题，并获得了有关运输风险和目的地市场的信息。可以说，塞法尔迪犹太商人的代理人遍布许多重要的海洋贸易线路。例如，以从事钻石贸易著称的利沃诺犹太商人埃尔加斯与西尔维拉家族（Ergas & Silvera）的代理人遍布地中海—西北欧—印度洋贸易沿线，包括阿勒颇（以及亚历山大勒塔、塞浦路斯及其他奥斯曼帝国的港口）、威尼斯、热那亚、阿姆斯特丹、伦敦、马赛、里斯本、果阿等主要港口。^③该家族的代理人主要分为三个层次：直系亲属、其他塞法尔迪人、非犹太人。借助发达的代理人机制，不同地区的犹太人得以与最遥远的地区开展直接的商业活动，在信任和合作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并维持稳定的联系网络。

第二，规范合伙关系。在跨地区贸易过程中，由于经常面临与其他犹太人以及非犹太人开展贸易的情况，到 16 世纪在犹太商人中间出现了重要的法律文件——“合伙证明”（*Hetter Iska*），它在“埃斯卡”^④的基础上结合了“康曼达”^⑤的某些特征，以商业契约的形式明确规定参与商业投资的各方（商人及其代理人）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在运输商品过程中发生的遗失或损坏情况进行赔偿等具体事项。^⑥

① Aryeh Shmulevitz, *The Jews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Late Fifteenth and the Sixteenth Centuries: Administrative, Economic, Legal and Social Relations as Reflected in the Responsa*, Leiden: Brill, 1984, pp. 143-144.

② Daniel Jütte, “The Jewish Consuls in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A Study in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Networks (1500-1800),” in Andreas Gestrich and Margrit Schulte Beerbühl, eds., *Cosmopolitan Networks in Commerce and Society, 1660-1914*, Lond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2011, pp. 153-186.

③ Francesca Trivellato, *The Familiarity of Strangers: The Sephardic Diaspora, Livorno, and Cross-Cultural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p. 194.

④ “埃斯卡”（iska）最初出现在《巴比伦塔木德》中，意为“半贷款与半信任”（semi-loan and semi-trust）。它将借贷关系转换成隐名合伙关系（silent partnership），从而允许在犹太人中间进行以取利为基础的贷款而不违反《托拉》有关不得在犹太人中间开展借贷活动的禁令。参见 Ahmad Kaleem and Mervyn K. Lewis, “Non-Interest Financing Arrangements in Three Abrahamic Religions,” in Mervyn K. Lewis, Mohamed Ariff and Shamsheer Mohamad, eds., *Risk and Regulation of Islamic Banking*,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2014, p. 158.

⑤ “康曼达”（commenda），也称合伙制，是自 12、13 世纪开始在基督徒商人中间广泛使用的合伙制商业模式。参见 John H. Pryor, “The Origins of the *Commenda* Contract,” *Speculum*, vol. 52, no. 1 (January 1977), pp. 5-37.

⑥ J. David Bleich, “Hetter Iska, the Permissible Venture: A Device to Avoid the Prohibition

它对从合伙关系中获取利润进行了具体规定：首先是对责任的划分，通常投资者承担 $2/3$ 的责任，代理人承担 $1/3$ ；其次是对利润的划分，通常 $2/3$ 的利润归代理人， $1/3$ 的利润归投资者。^① 这种合伙关系是一种利润共享和风险分担机制，投资者“平等地分享”合伙人赢得的利润，同时共同分担风险，从而大大便利了犹太人开展海外贸易活动。

第三，拓展海上保险业务。在中古与近代早期的远程贸易中，“海上保险”（maritime insurance）^② 是常用的信用工具之一。13、14 世纪，海上保险率先在热那亚和其他意大利城市发展起来，已知最早的一份保险单来自 1347 年的热那亚，^③ 随后在西欧各地商人中间流行，并逐渐走向专业化。15、16 世纪，流散到意大利半岛尤其是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等港口城市的塞法尔迪人，在从事地中海等远程贸易活动时使用了保险单据“坎比奥”（cambio），这种单据类似贷款，由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支付一定的利息，通常为商品价值的 $3\%—4\%$ 左右。16 世纪萨洛尼卡的绝大部分塞法尔迪犹太商人频繁使用这种海上保险，经营范围涵盖意大利、埃及等地，随后扩展至奥斯曼帝国境内主要城市以及欧洲许多港口。^④ “坎比奥”被视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契约，由于保险人拥有至少与贷款同等价值的货物，从而确保了贷款的偿付。这种商业经营手段得到了拉比权威的认可，成为一种保护货物在不同港口之间运转的制度。

第四，开展汇票业务。由于远程贸易的买卖双方相距遥远，使用货币也各异，无法像国内贸易那样方便地结算，随着海上保险的发展，到 15 世纪前后，在地中海地区的主要港口开始出现进行国际结算的信用工具——“汇票”（bill of exchanges）。汇票作为一种无条件的委托支付，通常有三位当事人：开票人、付款人和收款人。尽管犹太人是否为汇票发明者存在争议，^⑤ 但他们无疑是汇票的熟练使用者和积极推广者。由于许多同胞散居在不同港口，犹太人在汇票的使用方面有着先天优势，

against Interest-Bearing Loans,” in Aaron Levine,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daism and Econom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98.

① Abraham L. Udovitch, “At the Origins of the Western *Commenda*: Islam, Israel, Byzantium?” *Speculum*, vol. 37, no. 2 (April 1962), p. 199.

② 海上保险源于古希腊罗马的“海事贷款”（sea loans），通过保险单的方式对船舶、货物以及相关利益（如租金、运费）等进行保险，以补偿因自然灾害或其他意外事故造成的海上运输损失。

③ James Franklin, *The Science of Conjecture: Evidence and Probability Before Pascal*,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74-277.

④ Benjamin Arbel, “Jews, the Rise of Capitalism and Cambio: Commercial Credit and Maritime Insurance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World,” *Zion*, vol. 69, no. 2, 2004, pp. 157-159.

⑤ 学者桑巴特对犹太人在汇票、证券、纸币、公债等信用工具中的作用进行了系统分析，

这为其开展远程贸易提供了重要便利。在一份 1550 年威尼斯基督徒商人的请愿书中，提及了塞法尔迪犹太商人在当地开展汇票业务的情况：“我们也像他们那样从事兑换，因为他们不断地向我们汇款……将现金送来以便通过我们的交易所将之兑换成里昂、佛兰德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货币……这些佛罗伦萨犹太居民的情况，也适用于同样来自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其他犹太商人，这些人逗留在佛兰德、里昂、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和其他地区，他们尽力与我们做生意，不仅从事兑换活动，而且将佛兰德的货物运到这里，出售来自西西里的谷物，并购入其他货物以运往其他国家”。^①

（五）对传统宗教权威的挑战

如前所述，港口犹太人包括了马兰诺和新基督徒，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宗教迫害而被动选择皈依基督教，但其内心通常并不真诚接受新的宗教。不少马兰诺遭受着内部生活与外部生活的分裂，在两种信仰之间挣扎徘徊，陷入“在家是犹太人，在外是基督徒”的身份困惑之中。当时有人这样描绘马兰诺无所适从的精神困顿：“出生时属于希伯来民族，一开始是一名基督徒，然后是一名犹太人，再然后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基督徒……他的推理是疯狂的，他充满无畏的言论，他是新奇之友，也是悖论的搜索者，最为糟糕的是，他的道德是可恶的。”^②

港口犹太人在摆脱宗教裁判所迫害的过程中，不再受传统拉比宗教权威的束缚。不少马兰诺在批评天主教及其实践的过程中滋长了怀疑主义精神，他们在抵达较为开明与宽容的港口地区（尤其是荷兰及其殖民地）后本可以重返犹太教，但发现自己已经难以忍受犹太教的精神束缚：“他们（改宗者）习惯于秘密地或者公开地批评天主教会及其传说、法规、牧师及其生活方式。当这种类型的马兰诺抵达荷兰尤其是阿姆斯特丹时，他们发现所处的犹太社会与其父辈曾在西班牙遭遇非犹太文化时的悲惨经历十分相似……对于马兰诺来说，很难不去批评犹太哈加达和哈拉哈，并且他们发现很难接受拉比和社团领袖对个体生活方式的控制，尤其是在他们曾经如此强烈地反对伊比利亚半岛教会权威的这种控制之后”。^③

正是在此新旧身份的转换之际，产生了最早的怀疑主义思想，由此揭开了犹太

强调“作为国际贸易的中间人，犹太人大规模使用了外汇机制，它传统上流行于地中海国家，后来又扩展至其他地区”。参见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第 44 页。

① David Kaufmann, “Die Vertreibung der Marranen aus Venedig im Jahre 1550,”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vol. 13, no. 3 (April 1901), p. 530.

② Yirmiyahu Yovel, *Spinoza and Other Heretics*, vol. 1: *The Marrano of Rea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66.

③ H. H. Ben-Sasson, ed.,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719.

人世俗化的序幕，有学者将马兰诺称为“欧洲现代化的开端”。^① 马兰诺怀疑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有 17 世纪中叶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世俗思想家乌里尔·达·科斯塔 (Uriel da Costa, 1585-1640)、胡安·德·普拉多 (Juan de Prado, 1614-1672) 和巴鲁赫·斯宾诺莎 (Baruch Spinoza, 1632-1670) 等，他们基本上都是源自葡萄牙的塞法尔迪犹太人。达·科斯塔因否定口传律法被两次革出犹太社团，他又两次悔罪，最终不堪其辱选择自尽；普拉多则进一步提出自然神论思想；斯宾诺莎将这种怀疑主义精神推向顶点，他大胆质疑《摩西五经》的神圣性，强调历史的最高主宰是自然而非上帝，这种理性主义解释挑战了拉比当局的宗教权威，他因此被革出阿姆斯特丹犹太社团。斯宾诺莎是第一个脱离犹太教但又没有皈依其他宗教的犹太人，被称为“第一个现代犹太人”。^②

在思想层面总的趋势是，港口犹太人的宗教实践与精神生活变得自由和多元。通过与外部文化的频繁接触，对更大范围的基督教文化的融入，宗教实践不再是社团生活的中心；^③ 作为所有这些现象的结果，出现了传统宗教观念的怀疑和对拉比权威的挑战。学者乔纳森·以色列指出，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塞法尔迪人中间的自然神论发展为“真正的思想与文化实质，并对拉比权威、犹太传统及其遵守构成持久威胁”。他认为，在 1740 年之前存在一场塞法尔迪人的犹太启蒙运动；^④ 他将塞法尔迪人反对宗教权威的行为置于整个欧洲的范畴中进行考虑，认为这些行为是当时欧洲知识精英对宗教发起挑战的一部分，并将斯宾诺莎称为“激进启蒙运动” (Radical Enlightenment)^⑤ 的先驱者。可以说，这些怀疑主义和自然神论思想，是现代性在塞法尔迪人精神世界滋长的重要体现。

(六) 法律与社会地位的提升

在参与殖民扩张和国际贸易的过程中，港口犹太人打破了传统犹太社会的许多约束，他们并非生活在自治的犹太社团中，而是生活在自愿组成的协会或商人团体中。港口犹太人所到之处，当地统治者通常从商业利益的角度给予各种特权，允许其自由定居并开展贸易活动，对其宗教活动不加干涉，这种行为被称为“公民包容”

① Richard Popkin, "Epicureanism and Scepticism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in R. B. Palmey and R. Hamerton-Kelly, eds., *Philomathes*, The Hague: Nijhoff, 1971, p. 348.

② 参见 Daniel B. Schwartz, *The First Modern Jew: Spinoza and the History of an Im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③ Adam Sutcliffe, "Sephardic Amsterdam and the Myths of Jewish Modernity,"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vol. 97, no. 3 (Summer 2007), pp. 417-437.

④ Jonathan I. Israel, "Was There a Pre-1740 Sephardic Jewish Enlightenment?" *Arquivos de Centro Cultural Calouste Gulbenkian*, vol. 48, 2004, p. 19.

⑤ Jonathan I. Israel, *Radical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 1650-17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civil inclusion)。^①值得注意的是，与宫廷犹太人享有的特权仅限于少数犹太精英不同，“公民包容”针对的是港口犹太人整个社团。传统观点认为，法国大革命通过《人权宣言》的法律形式首次赋予犹太人以公民权。实际上，港口犹太人享有的“公民包容”，已经给予犹太人事实上的公民权，使之具有几乎完全平等的法律与社会地位，这比法国大革命早了一两个世纪。

在重商主义政策的推动下，犹太人由于其商业价值而被允许进入各地定居，从而使港口犹太人的法律与社会地位有了显著提升。这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②一是颁发特许状，不专门针对犹太人，主要出现在安科纳、威尼斯和利沃诺以及波尔多、汉堡等地受天主教影响的地区。这种由当地统治者颁发的特许状，确保所有定居当地的外国人（包括犹太人）享有许多额外的权利与特权，包括免税权、豁免权以及完全的宗教自由。其中 1591 年和 1593 年利沃诺的托斯坎纳大公费迪南德一世·德·美第奇（Ferdinand I de' Medici）颁布的两个特许状最为著名；从 17 世纪末起，波尔多市政当局承认了新基督徒作为商人团体的特权，1723 年以缴纳税收为条件正式承认他们的犹太人地位。^③另一种情况是所在国的宽容声明与议会文件，专门针对犹太人而制定，以此确保港口犹太人的平等权利，这主要出现在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荷兰和英国。在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在进入当地不久的 1597 年就被给予公民地位，1654 年当地市议会又给予所有犹太人公民地位以推动贸易。^④居住在伦敦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在 17 世纪下半叶获得了宽容地位，分别由 1664 年来自枢密大臣的信件和 1685 年英王詹姆斯二世发布的宽容声明所确认。^⑤

就殖民地的情况而言，港口犹太人获得的法律权利更多，他们几乎不受限制地从事各种职业，不仅自由从事国际贸易和殖民活动，而且拥有土地或种植园，拥有

① Lois C. Dubin, *The Port Jews of Habsburg Trieste: Absolutist Politics and Enlightenment Culture*, p. 223.

② David Sorkin, "Merchant Colonies: Resettlement in Italy, France, Holland, and England, 1550-1700," in Brian M. Smollett and Christian Wiese, eds., *Reappraisals and New Studies of the Modern Jewish Experience: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M. Seltzer*, Leiden: Brill, 2015, pp. 128-134.

③ Francesca Trivellato, *The Familiarity of Strangers: The Sephardic Diaspora, Livorno, and Cross-Cultural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p. 76; Frances Malino, *The Sephardic Jews of Bordeaux: Assimilation and Emancipation in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France*, Alabam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78, p. 9.

④ Daniel M. Swetchinski, *Reluctant Cosmopolitans: The Portuguese Jews of Seventeenth-Century Amsterdam*, pp. 8-25.

⑤ David Katz, *The Jews in the History of England, 1485-18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42-143.

奴隶并使用其进行劳作，甚至还有犹太人参加军队。^① 1658 年荷兰议会承认那些被西班牙人在海上俘虏的犹太人为荷兰公民，这项法律事实上确认了荷兰及其殖民地乃至大西洋范围内犹太人的公民地位；在加勒比地区，摩西·德尔加多（Moses Delgado）为牙买加犹太人赢得了选举权。^② 尽管没有类似于《人权宣言》的法律文件来明确港口犹太人的公民权，但他们获得的事实上的公民权不仅为其开展商业活动提供了许多便利，而且为此后美洲犹太人获得各项自由奠定了基础，并推动着欧洲犹太人争取平等公民权的行动。

总的来看，港口犹太人通过积极参与殖民扩张和洲际贸易，现代商业社会^③的特征在这一群体中间不断成长：他们不仅主要从事跨文化贸易和国际经济交换，而且商人在其社团中处于领导地位，他们与主体社会进行了广泛接触，并在频繁的国际迁移中滋生了对传统权威的怀疑精神。更为重要的是，港口犹太人由于其商业价值被主体社会认可，而带动了法律与社会地位的提高。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商业社会特征的成长仅是其中的重要指标之一。虽然商业社会的概念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性”，但对于犹太人这个长期处在流散状态的商业民族而言，现代商业社会特征的成长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社会变革意义：它不仅为港口犹太人商业才能的充分施展带来了广阔空间，使之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而且促成了犹太人与主体民族的融合，进而成为推动社会内部发生结构性变化的重要催化剂。可以说，在港口犹太人那里，“商业性”与“现代性”实现了高度的同构，以与外部社会开展商业交往和建立国际经济网络的形式，推动着塞法尔迪犹太社会的现代转型。与之形成对比的是，18 世纪下半叶中东欧地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社会转型，与欧洲主体社会一样，是通过思想启蒙孕育现代性因素的成长，继而推动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和转型。通过对犹太社会转型不同路径的考察，可以更准确地理解犹太人对于现代精神的引领作用，他们因而被称作“现代性的先行者”。正如学者斯列兹金指出的，“现代是犹太人的时代……在资本时代，他们是最富创造力的企业家；在隔离时代，他们是最有经验的流亡者；在专业时代，他们是最

① Arnold Wiznitzer, “Jewish Soldiers in Dutch Brazil (1630-1654),”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vol. 46, no. 1 (September 1956), pp. 40-50.

② Harry A. Ezratty, *500 Years in the Jewish Caribbean: The Spanish and Portuguese Jews in the West Indies*, p. viii.

③ “商业社会”（commercial society）的概念最初出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所有人都依赖交换而生活，或在一定程度上所有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长为商业社会。”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37. 有关亚当·斯密的商业社会理论，可参见 Dennis C. Rasmussen, *The Problems and Promise of Commercial Society: Adam Smith's Response to Rousseau*,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8.

为熟练的专业人员。一些最古老的犹太特性——商业、法律、医学、文本诠释与文化中介——已经成为所有现代人最为根本（与最具犹太特点）的追求。通过作为古代人的典范，犹太人也成为现代人的楷模。”^①

结 论

综上所述，以塞法尔迪人及其后裔为主体的港口犹太人，穿梭在各大殖民帝国之间，形成了连接新旧大陆（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乃至太平洋等）的全球性贸易网络，成为当时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存在达三个世纪之久的港口犹太人及其贸易网络，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遗产。就犹太社会而言，港口犹太人早于阿什肯纳兹同胞一两个世纪就已具备了诸多现代性特征，现代性因子在该群体中间不断孕育，他们与主体社会的融合不断加深，并广泛接纳现代世俗知识，逐渐打破了传统的犹太社会结构，从而开辟了犹太社会现代转型的“另一条路径”。这条塞法尔迪路径是以商业交往和经济网络为核心，它与以思想启蒙和文化融合为特征的阿什肯纳兹路径如车之两轮共同冲破了传统犹太社会的藩篱，推进了犹太民族的现代转型。

传统观点认为，18 世纪下半叶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率先具备了现代社会的诸多特征，例如享有职业自由、与主体社会的融合、拥有平等的公民权以及世俗观念的出现等；而事实上，上述特征都可以在一个或两个世纪之前的以塞法尔迪人为主体的港口犹太人那里找到，具体体现为空前的人口流动与经济联系、频繁参与跨地区交往和殖民活动、商业价值的凸显、对传统宗教权威的挑战、法律与社会地位的提升等。萨洛·巴龙注意到，16 世纪的意大利和 17 世纪的荷兰的塞法尔迪犹太社团已经显现出了现代犹太社会的新特征，将之称为“意大利与荷兰的哈斯卡拉运动”（Italian and Dutch Haskalah），他尤其以阿姆斯特丹塞法尔迪犹太社团为例，强调当时这一群体中间的宗教和思想骚动“为犹太教的世俗化和犹太人整合到西方国家更大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奠定了坚实基础”。^②巴龙指出，“哈斯卡拉运动的所有根本趋势，例如世俗知识、‘纯粹的’希伯来语、历史主义和个体对社团权力的反抗，在门德尔松很久之前的意大利和荷兰都变得越来越显著”。因此，他得出结论：“与犹太人莱奥内·埃布里奥^③和斯宾诺莎相比，德绍的贤哲（即摩西·门德尔松）似乎

① Yuri Slezkine, *The Jewish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

② Salo W. Baron, *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vol. 2, 1937, pp. 207, 210.

③ 莱奥内·埃布里奥（Leone Ebreo, 1465-1521），即犹太·阿布拉瓦内尔，16 世纪初意大利塞法尔迪犹太社团领袖。

更是一个中世纪的护教学家而非现代的世俗哲学家。”^①

从全球视野来看，港口犹太人与殖民扩张、海洋贸易等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群体积极参与早期全球交往，在此过程中催生了现代商业运作模式，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由家族分支构成跨地区的商业纽带、分担商业风险的代理人机制、出色的文化柔韧性和中间人身份、对财富之流与商业机会的敏锐洞察力等，尤其以贸易网络的方式开展洲际性经济交往（成为跨国公司的前身），这些都使犹太人成为当之无愧的资本主义先驱者之一。此外，港口犹太人在合伙证明、海上保险、汇票等信用工具发展为西方近代商业规范的过程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有学者将之形象地称为“犹太桥梁”（the Jewish Bridge）。^②

作为地理大发现后人类文明转向海洋这一新的社会现象的推动者，港口犹太人群体所具备的边际性、流动性、世界性特质成为其获得商业成功并维系全球性贸易网络的根本性基因。在欧洲其他群体与海外的交往仍十分缓慢之时，港口犹太人作为典型的贸易流散社群（Trading Diaspora），依托散居在各地的同胞所拥有的大量财富与广泛联系，以贸易网络的形式广泛参与全球交往和殖民扩张，不仅推动了犹太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且成为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重要先驱者和引领者。港口犹太人及其构建的跨地区贸易网络，充分诠释了少数群体在参与并推动近代早期全球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是对普遍存在于犹太史与世界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的突破，为窥探犹太社会现代转型以及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发端提供了独特视角，对这种“犹太因素”的重新审视无疑从一个侧面丰富着我们对于全球历史多元构成及其复杂动因的认知。

〔责任编辑：焦 兵〕

① Salo W. Baron, *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vol. 3, p. 139, note 13.

② Scott B. MacDonald and Albert L. Gastmann, *A History of Credit and Power in the Western World*,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4, chapter 4.

value the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stics of poem, *ci*, and *qu*, regard them as different artistic and historical forms, understand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mong them, thus rethink the happening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yles of *xiqu* and novels. Through research of text and art, we will advance the relative subjects of historical theo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genealogy of literary form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wholeness and long-term.

(8) Trade Networks among Jews in Port Cities and the Modern Transition of Jewish Society

Zhang Qianhong and Ai Rengui • 181 •

In the early modern time, many Sephardi Jews and their descendants carried on trans-regional business at many port cities. These Jews in port cities involved in colonial expansion and trans-Atlantics trade, which formed global trade networks connecting Mediterranean, the Atlantics,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Pacific Ocean. They gained recognition from mainstream society due to their commercial status, and gained unprecedented civil rights. This group bore many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ommercial society: unparalleled fluidity and kinship networks, global trans-cultural attribute, the dominance of commercial value, modern means of management and the usage of modern creditability, confrontation to the traditional religious authorities, and the raising of legal and social position. This group of Jews who were active for more than three centuries and their trade network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y had not only contributed to the expansion of global economic connections in early modern, but also promoted the modern transition of the Jewish society, and stand for another path of modernity within the Jewish society.
